

聚智献策宁波“十三五”规划

让万隆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理论圆桌

主持人：
“十三五”时期，是宁波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创新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进一步提升全面小康社会和国际港口城市现代化水平、深入推进“四好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时期，编制和实施好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而深远。我市“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为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凝聚社科界专家的智慧，对重大问题形成共识。最近，市博士联谊会组织有关专家对此进行深入研讨，提出了不少“接地气”的建议和创新思路。

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傅晓：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谋划“十三五”的发展，必须站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横坐标和历史发展的纵坐标上进行思考，全面回顾宁波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全面分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特点，为宁波未来的发展理清思路。

傅晓：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谋划“十三五”的发展，必须站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横坐标和历史发展的纵坐标上进行思考，全面回顾宁波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全面分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特点，为宁波未来的发展理清思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宁波的发展到底靠的是什么？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可以列举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宁波做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走在前列，在制度的创新上走在前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打破国有和集体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到现在，民营经济占到经济总量的70%以上，所吸纳的劳动力占80%以上，贡献的税收占70%以上。更重要的是，民营经济不但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宁波每年申请的专利90%是民营企业创造的，每年转化的发明专利也主要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第二，开发区的产生和发展。除了边境贸易区，几乎各种各样的开发区形态宁波都拥有，这也是体制创新的结果。第三，相对比较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制度创新表现为市场主体企业、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演进，说到底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常的重要体现就是企业的发展程度。正是由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推动，宁波政府有比较强的服务意识和比较高的办事效率以及比较高效的管理体制。

宁波三十多年的发展，主要动力来自于改革开放，来自于体制机制的创新，这并不是说改革的红利、体制机制创新的红利已经释放完了，相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宁波发展的根本动力仍然来自于改革，来自于体制机制的创新。

第一，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扫清体制机制障碍。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领域，民营经济皆可进入，特别是在利润丰厚的一些领域，宁波能不能先行先试，走在前列。比如在港口建设和发展、轨道交通、电信和通讯以及金融领域，宁波可以率先尝试。在产业基金的建立和发展方面，能不能吸引民营资本参与，并集中支持民营企业。第二，改革开发区的管理体制，让开发区的活力进一步释放。开发区承担着引领经济转型升级、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任，也应该成为改革和体制创新的排头兵。纵观先进地区的开发区，早已实现由管委会为主的体制向以公司制为主的体制的过渡。比如，天津的滨海和上海的浦东的各类开发区，管委会都高度精简，充实和拓展开发公司的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三，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自身的改革关系到改革全局的成败，没有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就没有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很难有鼓励创新、推进创新的良好氛围。现在宁波的政府管理统筹不够和管得过死同时存在。对于统筹不够，表现为战略上的谋划和规划上的统筹还不够，各个县市区、各个开发区的功能定位不明确，互相拼政策、拼资源，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所谓管得死，是在行政审批上管得过死，该放的权力并没有放下去，效率不高。对此，要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战略上的谋划；强化规划的统筹，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制定覆盖全市各个村的城乡发展规划；进一步下放权力，可以参照香港政府向义工的做法，把能下放的权利都下放，努力提高政府的效率；进一步改善发展的环境，坚持软硬环境兼顾，通过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生态环境吸引人才、吸引企业。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构建宁波开放新格局

吴向鹏：“一带一路”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重大国家战略，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改革开放先行区，宁波要把握机遇、超前筹划、发挥优势、见诸行动。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赢得主动、抢占先机。

1、打造港口经济圈，营造发展新空间。港口是宁波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宁波要以建设港口经济圈为抓手，引领宁波一舟山港一体化、宁波都市区规划建设和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提升集聚辐射带动能

主持人：李磊明
嘉宾：傅晓（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吴向鹏（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宋炳林（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吴玉霞（宁波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朱友君（市滨海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力，推进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打造全国多式联运枢纽。优化“无水港”布局，建设宁波—华东地区集装箱海铁联运示范通道，构建“甬新欧”贸易物流线，促进港口腹地向长江流域、西北地区延伸拓展。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开放合作，构建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机制和合作服务网络，进一步提升港口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2、推动产业集群及组织转型升级，打造一批国际竞争力强劲的产业。紧跟新兴经济业态发展的新趋势，突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作用，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市场化导向，国内重点面向中西部，国外重点面向东亚、南亚、东南亚等人口密集的地区和国家，寻找市场机遇，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全力推动更多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较强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或研发类的跨国企业总部在甬集聚，加快提升宁波在产业创新、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国际地位。构建区域创新集成网络，形成以集成商为中心，有机整合创新源，实现创新成果有效转化、生产、营销、运营的组织模式。

3、转变对外开放合作方式，打造“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先行区。立足“两头在外”的经济格局，重点寻找资源和市场，开展对外经贸合作。依托宁波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优势，引导和鼓励宁波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参与境外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农产品深加工等，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模式，引导宁波市跨国企业发展和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支持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股权投资、境外上市、联合重组等方式，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推动境外投资企业符合条件的境外资金、能源、矿产、农产品等输入国内的政策便利化，推动贸易与产业协同发展，全面对接上海自贸区有关政策，积极参与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区建设。

4、率先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建设网上丝绸之路。顺应贸易电子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以梅山保税港区等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区域为龙头，以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为目标，以大宗商品和日用消费品贸易为重点，以平台建设为途径，建设面向特定区域、发展特色贸易的“网上丝绸之路”试点城市。加快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试点的创新突破，争取在单一窗口平台、大数据建设、数据统计等公共服务及贸易便利化上有重大突破，有重点地支持一批教育、旅游、文化、影视等服务贸易电商化，加快宁波服务通过电商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推动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交通节点和节点城市建立仓储设施和分拨中心，推动与有条件的地区设立电商产业园或物流基地等。

5、加快体制机制突破创新，完善开放合作新机制。完善与中央、省区的对接交流机制，加快与中央部委对接，争取市内重大建设项目列入国家“一带一路”总体规划。加快建立市内专项基金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对重点项目、重点企业进行融资支持的政策体系。争取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机构的资金支持。结合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标准体系的新变化，全面开展投资开放创新、区域合作创新、离岸型功能创新、税收设计创新、政府管理服务创新等一系列制度创新的试验与示范，在接轨国际的制度规则、法律规范等方面保持先发优势，引领全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

更好发挥政府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

宋炳林：近年来，面对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出口市场需求下降、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等各种挑战，宁波大力实施“双驱动四治理”决策部署和“经济社会转型三年行动计划”，通过谋划建设一大批产业项目和平台载体，有力推动了我市现代产业体系的优化。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宁波正处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新常态”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仍然艰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角色。为此，各级政府应加快转变职能，着重发挥好五大作用。

一是努力营造产业发展公平环境。宁波民营经济较为发达，政府应坚持“一视同仁”的理念，加快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稳定的市场预期，使各类资本都平等拥有使用要素资源的权利，让各类企业都能在同一平台上竞争，进而夯实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基础。一是要加快各类财税优惠政策清理。按照中央要求，统一清理全市各种税收返还、

财政补贴奖励、土地出让等政策，不符合法律法规的一律取消。二是要切实加大破除垄断的力度。宁波应以新型城镇化国家试点为契机，有序推进市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推出一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PPP试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有效化解长期存在的民间投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现象。三是要加快产业资金支持方式转变。应进一步拓展全市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规模，重点运作好工业与信息化、海洋经济、旅游、电子商务等专项基金，确保基金运作的市场化与专业化。

二是统筹优化市域产业空间布局。宁波应坚持“区域统筹”的理念，切实转变以往“乱铺摊子、无序竞争”等粗放型空间开发模式，加快形成集约、高效的产业空间布局。一是强化园区规划建设中的产业融合理念。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应从传统单一的工业园区、服务业园区转向更为综合的“产业园区”，在混合用地出让、产城功能配套、园区企业化运作等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二是加强产业园区的规划统筹。结合“多规融合”改革，高水平编制我市产业布局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强化执行刚性。三是加大对现有产业园区的归并整合。鼓励引导省级及以上开发区通过异地共建、整合托管、一区多园等方式，建立针对产业细分领域、链式发展、融合发展的专业园、园中园、拓展园，加快对县(市、区)、乡镇(街道)产业园区的整合及归并，推进产业布局从园区多点分散向高密度集群转型。

三是加快集聚产业创新优质资源。政府应坚持“多放少管”的理念，进一步落实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城市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的营造上来。一是要改革科技创新体制。要从体制上研究解决我市科技资源错配化、科技成果评价行政化、公共创新平台低效化、城市创新文化弱化等问题，最大限度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创新动力。二是要集聚和用好各类人才。要加快改革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出台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科技人才通过创新获益，形成个人、企业和城市发展利益相一致的“激励相容”环境。三是要聚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立足宁波现实基础，主动对接“中国制造2025”战略，重点扶持新材料、新装备产业，聚焦石墨烯、伺服电机、诊断试剂、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细分领域，争取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四是要优化创业创新生态。探索运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的“众创空间”，培育虚拟创客、类社区、类孵化器、供应链管理等模式创客，加快集聚金融、保险、咨询、检测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促进创新资源和产业要素的高效对接。

四是着力培育新兴产业市场需求。我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起步成长阶段，需要进行充分的市场引导，加快培育国内市场的认同程度。一是要开展一批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可探索将宁波建设成我国“新兴产业推广使用示范城市”，通过政府采购、试点示范、设立技术准入门槛、外部市场开拓等措施，优先推广使用我市石墨烯材料、新能源汽车、智慧应用等重要产品，使宁波成为创新扩散的全国领先市场。二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的建立。宁波要加强在市场配套体系建设方面的探索和试点，争取在新兴产业市场化和商业化平台的搭建方面形成典型的示范效应。三是引导企业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应加快制定宁波版的“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制造业结合，鼓励引导我市企业运用众筹、众创、O2O等互联网模式，构建基于市场需求的精准化商业创新网络。

五是切实提升产业项目服务效率。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以往通过财税优惠、土地减免等方式来招商引资的模式将难以继，产业投资发展的政务环境将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宁波应加大政府改革力度，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力度，进一步提升项目招商和园区运营效率，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优质的政府服务来凝聚发展新优势。

促进民生改善 推动社会建设

吴玉霞：“十三五”时期宁波社会建设和民生事业面临多重挑战，随着城镇化、信息化、老龄化、工业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领域的改革任务任重道远。“十三五”时期要促进民生改善，推动社会建设，就要强化改革创新意识，真正实现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重，把保障民生与推动经济发展统筹考虑和同步部署。着力深化以下几个重点领域改革。

一是继续推动深化教育改革，加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优化配置学前教育，适应城镇化进程和生育政策调

整带来的人口变化。均衡区域义务教育资源特别是教师资源配置，促进城乡学校建设标准化、教师流动制度化，提高义务教育内涵质量水平。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良好义务教育，后续升学和异地高考更加顺畅。推动产教融合，加快培养培训技能型人才，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优质人力资源。加快推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发展的有效途径，实现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的转型。

二是深化卫生计生事业体制改革，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得到实质性缓解。医疗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公共卫生和医疗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和布局，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公立医院改革获得实质进展，全科医生制度建立起来，分级诊疗得到普及。跨省市就医和医保结算更加便捷，建立流动人口的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医疗纠纷预防调解机制的“宁波解法”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三是养老服务更加专业化，更贴近老年人需求。居家养老服务更加普及和便利，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向基层建立网络，整合社区的各种养老资源，向社区辐射，延伸到家庭。公立养老机构 and 民营养老机构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和相得益彰发展。社会资源更多关注失能老人，街道乡镇、城乡社区建立老年日间照护中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始施行。养老服务行业标准更加完善，专业化水平得到提高，养老领域更是成为地方高校开设新专业和推动大学生就业的新兴领域。

四是加强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和公共服务，筑牢民生底线。确保困境儿童、高龄老人、失能老人、重度和贫困残疾人等特困群体，都能享受到兜底的社会救助服务。加强对失独家庭、单亲母亲、隔代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精神慰藉，让这些特殊家庭得到社会政策的温暖。

五是统筹推进文化体育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更加可及。继续加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立健全文化发展经费保障机制。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扩大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范围。发挥基层综合性文化中心作用。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地保护，地方文化得到更好传承和发扬光大。

六是实施“人的城镇化”，稳步推进城镇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三五”时期，稳定居住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都能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在宁波安居乐业。区分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健全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分层分类和有梯度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加强监督和评估。作为过渡政策，将居住证制度与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相挂钩，继续完善宁波市积分入户的差别化落户政策。引导长期居住和有稳定职业的流动人口户口稳定下来，建立长远的发展预期。

把握互联网行业前沿 打造宁波发展新引擎

朱友君：互联网依据其行业的普惠特性，以及对民众生活和工作全方位渗透的影响，已经成为关键的发展新动力之一。把握好互联网行业的前方，挖掘海盐创业氛围内涵，将是宁波在“十三五”期间重新振兴信息产业、引导海内外人才来甬成就梦想的重要命题。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宁波具有了一些信息产业基础，在企业数量和活跃度上略有成果，也在全国较早启动智慧城市战略的全面建设。但是，因为受到传统制造业集群以及企业依赖外贸优势盈利的思维限制，宁波企业对互联网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还不重视，信息产业整体规模不大，与国内同类城市的产值差距较为明显，也没有培养出几家全国性龙头企业。正视宁波互联网行业的这些客观情况，不仅仅是坦然面对压力，更要从此找出努力的方向与契机。

首先，政府部门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时，面对信息化这一公共产品，既要继续加强宏观调控，也要对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转变管理思路。对智慧城管、“云医院”等政府项目，也要只讲投入、不讲投资回报和市场生态，要注意产值、民众消费与人才投入的对比。合理运用引导基金，务实地调整政府项目准入标准，既能放松项目质量，也不能刻意放大指标，如此才能给予本地信息类企业较多的扶持机会。

其次，宁波相关传统优势行业，应积极引入物联网应用，加快自身的转型升级和重塑“宁波智造”的品牌核心竞争力。从传统的制造集群，到今天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把握定制化、个性化供货的“小而美”趋势，是宁波众多中小企业解决“散而小”的有效措施。例如对于慈溪小家电，可以通过智能化技术介入，打造其冲击国际市场的智能家电大军。

再次，要加快步伐，跟上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应用这两项新兴产业，将带来一份产业高地，营造高新项目氛围。宁波拥有石化、外贸、物流三大优势产业，由此带来诸如大宗商品交易、航运保险、海洋生物养殖、近海资源等具备数据价值的行业，行业大数据的开发、储存以及“资源化”，能带动诸多传统行业的活力，但是，不能笼统讲大数据，要针对特色的行业大数据，掌握数据“话语权”。有关部门要在充分调研和创意对接的基础上，有机容纳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进入行业市场，项目协作，建立“智慧海游”、“智慧养老”等富有创意的宁波模式，并促进配套的媒介信息估值、北斗卫星定位、信息安全等带来衍生商业环节诞生。

观点聚焦

1955年4月18日—24日，首届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在印尼万隆成功举办，亚非国家在会上共同倡导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形成了以“团结、友谊、合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等为核心的万隆精神。在纪念万隆会议成功召开6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雅加达会议中心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并发题为《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就弘扬万隆精神提出“三点倡议”，即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

万隆精神的由来与时代内涵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余建华研究员在《解放日报》刊文指出，万隆会议是现代国际关系进程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丰碑，会议提出“十项原则”的十项原则，实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体现与延伸，成为亚非国家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石，也是倡导世界各国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所遵循的国际关系准则。万隆会议体现出一种亚非国家为民族独立自由、世界和平发展而共同存异、和平共处、团结合作的精神即万隆精神，更是以其珍贵的精神财富载入人类史册，也引领着当代中国坚定不移地团结与依托广大亚非国家，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殖民体系已经土崩瓦解，冷战对峙已成历史，各国各地区相互联系和依存明显增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题。新世纪十多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总体增长高位运行，新兴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亚非地区，其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突出。但另一方面，全球发展不平衡，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不稳定，局部动荡此起彼伏，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极端化、能源资源和网络安全等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威胁和制约亚非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复杂巨变的今天，万隆精神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新，依然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60年前万隆精神的时代主题为和平相处、求同存异，而今天，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则是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亚非国家应该与时俱进地传承万隆精神，并赋予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命运共同体理念由此应运而生。

习近平主席在谈及南南合作时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应该抱团取暖、携手前行。阮宗泽分析说讲“抱团取暖”，不是说只顾自己或者说建立一个联盟，而是倡导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合作，共同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发展中国家过去有着相似的经历，现在面临相似的发展任务，更应该、也更有条件合作。这次的会议有一百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也展示了亚非国家是可以团结的。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有新的动力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研究员认为，要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合作，首先，要坚持和发扬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次，要维护联合国宪章，维护现有的公正合理的秩序，反对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最后，伙伴关系不是结盟的关系，中国还是要继续推动“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

“三倡议”赋予万隆精神新内涵

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习近平主

“绿色化”有待人人参与

陈依元

理论漫谈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了“绿色化”概念，指出应“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这是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概念的延伸。换言之，“四化”变“五化”。这一新提法充满希望，饱含深意。

“绿色化”指什么？它经历了三次概念更新：从“植树造林、绿化”到“有机、无公害等”，再到“环保、生态友好”。如今“绿色化”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化工、制造业、行政管理等领域。在经济领域，它指“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前不久在全国人大团会上，习近平称赞生态文明生态很好，甚至可以开发“空气罐头”，称赞云南“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美景，不啻是对“绿色化”形象诠释。可见，“绿色化”既是价值取向，也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有人总以为“绿色化”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事，这是不对的。政府和企业固然应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但百姓的作用也不可或缺。“绿色化”有待人人参与，发挥作用，它应成为每个人的追求与行动。建设生态文明，首要的是唤醒人们内心对自然的敬畏、对绿色的尊崇，激发人们的参与感。

之所以这么说，缘于笔者亲历的几件事。不久前随团去四明山旅游，见到个别团友不注意呵护山区生态，有的拔野菜、摘马兰，践踏了一大片草皮；有的挖了好多野花；有的则挖了不少腐殖土甚至野生小树带回家“美化”阳台。团友自认为这

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提出了赋予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一系列主张，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地造福亚非人民指出了方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点倡议”是“万隆精神”的延展。60年前的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加强亚非合作是南南合作的核心部分，而南南合作的意义更广，包括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只靠南南合作不会获得全面的发展，南南合作并不是要搞因伙、拉帮结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加强与彼此的合作。要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在不附加政治条件基础上，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缩小南北差距。G20机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等都体现了南南合作。因此，强调南北合作也体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理念，符合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万隆精神”。

发展中国家要联合自强

阮宗泽认为，习近平主席之所以强调“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在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国家合作的方向。现在的世界是不平等的，西方国家仍占国际体系的塔尖，他们在主导着国际体系，话语权比我们大，所以发展中国家要联合自强，通过更多的务实合作来提升各方面实力，从而获得有力的话语权。

习近平主席在谈及南南合作时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应该抱团取暖、携手前行。阮宗泽分析说讲“抱团取暖”，不是说只顾自己或者说建立一个联盟，而是倡导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合作，共同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发展中国家过去有着相似的经历，现在面临相似的发展任务，更应该、也更有条件合作。这次的会议有一百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也展示了亚非国家是可以团结的。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有新的动力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研究员认为，要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合作，首先，要坚持和发扬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次，要维护联合国宪章，维护现有的公正合理的秩序，反对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最后，伙伴关系不是结盟的关系，中国还是要继续推动“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

(李 伦)